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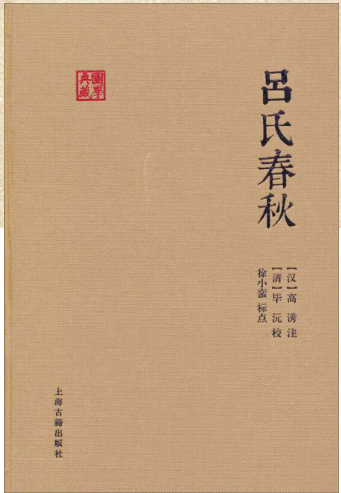


《吕氏春秋》的治国智慧

□ 陈广忠

核心阅读

▲ 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及门客所著《吕氏春秋》，融合百家治国政策，成为“史家之宝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过《吕氏春秋》中的经典名句，在谈到古人懂得发挥舆论的作用时，引用“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这句名言。今天我们了解和研究《吕氏春秋》，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战国晚期（前329年）的秦国都城咸阳，发生了一件轰动天下的大事：相国吕不韦和门客所著20余万言的大作《吕氏春秋》，在咸阳城门上展示，有能增减一字的，赏赐千金。这部集主创和三千门客智慧的治国理政的创新之作，成为“史家之宝库”。

构思严谨 纲举目张

《吕氏春秋》结构严谨，全书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160篇。浑然天成，纲举而目张，有条不紊。

全书以“十二纪”为篇首。用“孟春纪”“孟夏纪”“孟秋纪”“孟冬纪”等“四立”开篇，每月内安排5篇短文，加上“序意”，共61篇。主旨是探究天人关系，准确实施政令。比如“孟春”，就有“王布农事，禁止伐木”等内容。“仲春”的春分时节，要“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就是要校正所有的度、量、衡器具。

“八览”，分为“有始”“孝行”等8“览”。览，就是观览、考察的意思。每“览”统领8篇短文，共64篇（缺1篇）。比如《有始览》，天象有“九野”“二十八宿”，地形有“九州”“九山”“九塞”“九藪”“六水”，气象有“八风”，节气有“冬至”“夏至”等，其功用是“圣人览焉，以观其类”。

“六论”，论，即论说。每“论”有6篇，共36篇，主要用充满哲理的故事，说明人世间的各种道理。比如《察传》有“三家涉河”的故事。“三豕”当为“己亥”，字形相似而误。比喻不求甚解，以讹传讹。

以“道”为宗 博取诸家

东汉高诱在《吕氏春秋》注中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就是以“道家”为主，融合百

家，这是治愈春秋、战国500余年的战争创伤，完成秦统一天下的良策。

《吕氏春秋》确立了集中统一、兼采众家的治政思路。《不二》说“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而“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虚，孙臧贵势”，只有打破门派陋习，兼取各家之长，才能“齐万不同”。

《吕氏春秋》推崇“道家”，认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理念。其中的主要观点，大多源于《老子》。比如，在论述自然天道观时，《去私》有“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化自《老子》二章“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关于万事万物祸福依存和互相转化，《制乐》有“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则取自《老子》五十八章。对于顺应自然天地的规律，《序意》主张“法天地”，则化自《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墨家节用、尚贤、尚义等观点，也为《吕氏春秋》所吸收，其书出现“墨子”19次，有的章旨与墨子相近。《当染》与《墨子·所染》相似，强调环境、师承、教育、文化对人的重要影响。《知士》中论及“尚贤”，认为有“千里之马”，“非得良工”，不能识别；“士亦有千里”，而气节高尚、献身正义的人就是“士”中的千里马，能够使用的，只有贤人。而“静郭君”力排众议，信任“荆貌辨”，成就大事，更是“尚贤”的例子。

《墨子》中有《贵义》，《吕氏春秋》则用三篇《义赏》《高义》《无义》来阐述“义”理，其中包含利人、救危、公正、诚信等内容。《贵义》中说“天下莫贵于义”，《天志上》强调“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治，无义则乱”。而《吕氏春秋·论威》也有“义也者，万事之纪也”；《无义》中说“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可知《吕氏春秋》传承墨家之“义”，作为道德规范，来推崇和践行。

儒家的“仁政”思想也影响了《吕氏春秋》。《论语》中出现“仁”字109次。《吕氏春秋·适威》说“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爱类》有“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就是说，对于“仁义”“忠信”等儒家的价值观，《吕氏春秋》并不排斥，时有采撷。

对于强大的秦国，统一天下指日可待。《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孟秋纪”“仲秋纪”中，就有8篇论及军事。而《吕氏春秋》的“义兵”论，则是其中最精彩的篇章。“义兵”体现在“行德爱人”“用兵有时”和“救守之心”，与法家商鞅、兵家吴起等实施的重杀戮截然不同，显示了吕不韦统一天下，恩宠百姓的胆识和气度。

在《孙臧兵法·将义》中就有“义者，兵之首也”的论述，《吕氏春秋》给予继承和发展。《荡兵》说“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义兵”的目的是：诛杀暴君，拯救百姓。《禁塞》中认为“兵苟义，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只要是“义兵”，进攻、防守，都能取胜。《怀宠》中写道：“义兵”到了国都城邑，不祸害五谷，不刨坟掘墓，不砍伐树木，不烧焚粮草，不烧掉房屋，不掠夺六畜。这就是2000多年前的“六大注意”，深得民心。因此，“故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兵不戢刃而民夫若化”。吕不韦的“义兵”说，在古代军事理论上，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以民为本 倾听民意

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国君把人民的事物作为根本，才能获得大众的支持，天下才能归附。《爱类》就说“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

顺应民心，则功成名就；失去民心，则一无所成。《顺民》中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也有也”。

作为丞相，吕不韦率先垂范，信任大众，善于运用众人的智慧，从而成就“不朽之盛事”。《史记》本传记载“食客三千人，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就是让门客们‘人人’参与创作，才能成就鸿篇巨制”。

善于倾听民众的呼声，接受大众的谏言，克服国君不能“自知”的弊病，这是治政的要务之一。《自知》中说“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诽谤”，即批评指责之义。唐尧、虞舜、商汤、周武王皆为古代明君，他们设立收集民意的“谏鼓”“谤木”“司过”“戒鞀”，就是为了听取百姓的意见，匡正自己的过失，解决不能

“自知”的问题。

《吕氏春秋》赞赏大禹。为了延揽人才，礼贤下士，正己不足，了解民意，竟然“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从而成为历史佳话。

朴实平易 传扬天下

吕不韦执掌相位13年，倡导平易、通俗、朴实、简洁的文风，把严肃、高深的治国理论，用故事、寓言、俗语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布告天下。

比如，《吕氏春秋》主张“法随时变”。《察今》中记载：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

这个寓言要解决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先王之法”的重要问题。时势变了，法度也要随之变化。因循守旧，泥古不化，就像“刻舟求剑”那样可笑。

国君的修养，十分重要。而人主“恶闻其过”，就像“掩耳盗铃”一样。《自知》中说：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声。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

这个寓言揭示的，是国君怎样对待自己的失误。执政失败往往是客观存在的。对待过失，不能自欺欺人，讳疾忌医，而要及时矫正，避免失误。

《吕氏春秋》的语言美，冠绝先秦。现在演化流行的成语，就有40多条。如，《審为》：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指身在草野，心系朝政。《尽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比喻经常运动，可以避免受到外物的侵蚀。

《吕氏春秋》留下的经典名句，也有很多。比如，《举难》有“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国君用其所长。《察今》“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考察自己，能够知道别人；考察现在，可以知道古代。古今的道理是一样的。

历史文化典籍



精神”，不仅凝聚着中华优秀儿女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更凝聚着对现代文明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

竺可桢校长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求学的路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当年，浙大西迁几经辗转，历经艰险，在贵州遵义湄潭办学的7年间，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办学条件，都是十分艰苦，教学设备、教材，甚至给养都十分短缺。但就是这样的环境下，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数量之多让人惊叹。中国的物理学年会连续4次在湄潭召开。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收到来自“中国湄潭”的论文，其中仅用“湄潭”两字做标题的论文就达25篇。可以说当年的科学巨子们正是秉承这样的“求是”精神，创造了众多举世闻名的科研成果。

《四库全书》是中华经典文化得以传承延续的重要载体，竺可桢校长带领的文军长征队伍和文澜阁《四库全书》一起西迁，那段岁月，虽饱经风霜但历久弥新，虽艰难险阻但薪火相传，书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准确把握教育现代化的内涵

□ 芮鸿岩

核心阅读

▲ 教育现代化倡导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其根本目的是培养现代化的人，核心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

▲ 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这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

权，筑牢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引导广大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要着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党的基层组织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要引导广大教师坚持教书和育人、言传和身教、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建设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要精心培养和组织一支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工队伍，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日常、做到个人。要旗帜鲜明地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要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 and 形式，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推进教育现代化，就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首要之义，守护好思想政治工作这条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延续中华文脉 传承求是精神

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州的故事

□ 王敏

《四库全书》号称东方文字金字塔，成于乾隆年间，集数千人之力完成，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共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四库全书》共抄录7部，分藏于北京紫禁城的文澜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前四者统称北四阁，专供御览，后三者统称南三阁，对外开放，允许读书人阅览抄录。

文澜阁《四库全书》为其7部手抄本之一（总计3470部，42559册），现藏浙江图书馆。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全收藏受到严重威胁。1938年3月，为避免战事殃及，决定将浙江图书馆的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运至贵州保管。可当时运输经费和交通工具不足，此时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在浙大西迁运力紧张之时，向浙江图书馆伸出了援助之手，协助库书迁移，经辗转浙、闽、赣、湘、黔5省，行程2500公里，历千难万险于1938年4月底抵达贵阳，存放于当时的贵州省立图书馆。

1939年2月4日，日本飞机开始轰炸贵阳，为避免库书遭到破坏，省立图书馆决定将其从张家祠堂转移秘藏到鹿冲关森林公园地母洞内。库书藏至地母洞后，西迁至遵义湄潭的竺可桢校长甚为关心，两次赴洞内察看，告诫典守国宝之事一刻也不能放松，并提出将洞里

的木棚进行改造。其间在贵阳库书三迁秘藏地点（省立图书馆5个月，张家祠堂7个月，鹿冲关森林公园地母洞5年零8个月），共存放长达6年零8个月的时间。

1944年11月，日军攻入贵州黔南独山，贵阳危急，库书存放的安全又成问题，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紧急约见教育部商谈，再次决定将库书迁蜀。12月8日由战区司令部派出6辆大卡车，历行半个月时间，将库书运至重庆青木关，藏于教育部部长公馆内。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946年5月7日，全套库书由6辆汽车装运离开重庆运往杭州，历时2个月，全套文澜阁《四库全书》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

库书在黔藏地母洞时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命西南各大学遴选人才，对库书进行校勘。在校勘期间，抄录了大量关于贵州的史料记载，文澜阁《四库全书》中所集图书，绝大多数是贵州没有的，里面零散地记载了黔地的历史、地理、民族等方面资料的图书较多，是贵州文人、学者使用此书极好的机会，同时也填补了贵州史料的空白，帮助了贵州相关文献得以完成，编辑《贵州史料第一集》，1948年贵阳文书局出版《贵州通志》。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浙大和浙图等一批文军为保护库书这一文化瑰宝，与众多国人一道，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凸显了捍卫四库的拳拳之心，体现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那就是“求是